

新與舊的辯證及其紛爭：

重思「近代」觀念的形成

方 維 規^{*}

摘 要

時代界限經常是游移的，它會因不同因素而變化，而且取決於觀察問題的視角。關於世界史中的「近代」之斷代問題，便有諸多說法。一般說來，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可被視為近代之始，法國大革命或舊制度的終結則是近代的終了。近代是一個劃時代發明和發現的時代，一個名副其實的新時代；並且，時人已有生活在新時代的感受。可是對於新時代的認識，分歧彰明較著。17、18世紀，圍繞古今何者更勝的問題，歐洲知識界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尤以法國的「古今之爭」著稱。就厚今薄古者而言，他們的觀點足以體現那個時代的進步理念，亦可被看作18世紀啟蒙思潮的預兆。古今之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許多啟蒙思想家和作家與過去時代的關係，不僅仍在啟蒙運動的相關討論中發揮推動作用，甚至一再

^{*} 作者現為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暨博雅學院特聘教授。

啟發人們返回古今問題，而且一如既往，新與舊的對照總會帶來爭執。與啟蒙時代不同，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降，德意志哲學和美學理論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的相關討論，其中包括對「現代」這一時代概念的理解和對現代性意識的歷史哲學思考。

關鍵詞：近代／新時代、文藝復興、古今之爭、現代性概念

The Dialectic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and Their Quarrel:

Rethinking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Age”

Weigui Fang^{*}

Abstrac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eras are often dynamic and subject to various factors, while also being contingent upon the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he issue is examined. There have been diverse perspectives on the dating of the “Modern Age” in world history. The Renaissance and humanism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inception of the Modern Age, while the French Revolution or the end of Ancien Régime signifies its end. The Modern Age was an era of groundbreaking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a truly new era that people of this time already recognized themselves as liv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new era, however, varies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 prolonged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nd Liberal Arts College, Chongq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discourse emerged in Europe concerning whether the Ancients or the Moderns were superior, notably exemplified by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in France. The views of those who prioritized the Moderns over the Ancients are regard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progressive ideas prevalent during that era, thereby serving as a precursor to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significantly reshaped the relationship of many Enlightenment thinkers and writers had with the preceding eras, not only stimulating discussions related to the Enlightenment but also consistently provoking reconsider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issues. Furthermore,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invariably gives rise to debates. In contrast to the Enlightenment, German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theories profoundly influence related discourses in other European nations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beyond, encompassing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and the contemplation on the modernity consciousness from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Keywords: Modern/New Age, Renaissance,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新與舊的辯證及其紛爭：

重思「近代」觀念的形成

方 維 規

對於世界史中的「近代」，人們早就知道一些重大事件，早有一些固定看法。然而，漫長的近代歷史，尤其是早期近代的狀況，對很多人來說還是陌生的，既有知識實際上也相當有限。對於時代變化的歷史規律及其結構性問題的思考，也好像只是一些思想家和專家的事情，而且實際情況比想像的要複雜得多，難以捉摸的問題仍然不少。儘管對歷史時期的籠統劃分是不可取的，但對於歷史敘事和專門研究來說，分期自然是必要的，也絕不只是不得已而為之。各種不同的分期方案背後，自有特定的歷史依據和思想基礎。關於古代與近現代各自內在價值的判斷和界定，或者近現代意識與古代意識的分離亦即時代轉折點，都是值得一再探討的問題。說到近代，文藝復興乃應有之題；儘管這個概念對不少人來說耳熟能詳，且總能引人入勝，但它又是不純粹的。在近代之歷史長鏈中，「古今之爭」這一介於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間的重大文化思想史事件，不僅是時代變革的標記和範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啟蒙時代的新的歷史觀，甚至在這場文人之戰過去整整半個世紀之後，德意志哲人重又拾起古人和今人孰高孰低的話題，並重新定義了當代與古代、中世紀之間的關係。他們的歷史哲學思考，深刻地體現出現代性意識的發展。現代世界是一個「祛魅的世界」（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¹排除了一切超自然的東西，人為的東西自然而然。這些都是本文的論題，或曰筆者圍繞這些問題而寫下的讀書心得。

一、近代：文藝復興與發明和發現的新時代

(一) 歷史分期的難題與「近代」之斷代問題

歷史學的所有分期，都基於特定標準的設置，旨在系統化研究和對研究對象的界定和分類，但它終究只能近似歷史真實。也就是說，精確劃出時代界限是不可能的。「古代」、「中世紀」和「近代」這三個史學概念（這裡不包括常見的分期法之四個階段「古代、中世紀、早期近代／現代以及現代」中的「現代」），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完全由各自的特徵來表示時段，而是其與當今的時間關係所決定的。儘管如此，人們從來都期望能用這些概念來客觀、概括地描述世界的宏觀沿革史，爭議當然也從未斷過。這種分期也只是在某個特定時期才發生的，目的是以此取代其他分期法，或者與其他分期視角爭衡。雖然這種時代劃分似乎具有普遍意義，但通常也是根據特定區域內的特定事件之先後順序來構建的。²

對歷史進行分期，本身也有其歷史。迄今常見的時代劃分，顯然是歐洲在扮演主角，即歐洲古典時期、歐洲中世紀和歐洲的近代，此時也沒有量化標準可言，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分期，而是作

¹ 參見馬克斯·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一書。

² Horst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HWPh), vol. 6, ed.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84), 782.

為「理想型」（Idealtyp）而出現的。³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的發展理念也體現出這三個時代的排列，而他所謂歷史進步即「自由意識的進步」，實際上已被強權對外擴張的進展取而代之。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所理解的人類普遍歷史，已被起源於歐洲的發展史取而代之。⁴形而上的問題而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誰是近代向外擴張的推動者，誰只能承受其後果。這發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效果和影響也不一樣。幾個世紀的懷疑論，只體現於少數學者和思考者對這類問題的關注，即便其人數在不斷增長。

「近代」起始於何時？提出這個問題的人，首先必須弄清何為「近代」，還要對沿襲的古代—中世紀—近代之劃分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同所有時代概念一樣，「近代」概念波及甚廣。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在精神文化上的啟航，作為歐洲15世紀初開始對外擴張之標識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發現之旅，以及1517年之後摧毀（歐洲西部）中世紀統一教會的宗教改革——這三個相互關聯的歷史發展，常被歐洲史學視為早期近代的開端。這當然只是一個大概說法，而在實際分析中，情況比人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一切都取決於觀察問題的視角。從人文科學的角度來看，人文主義的新人類形象和以此為特徵的文藝復興，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1397?-1468）印刷術的突破性發明和1517年發軔的宗教改革，都被看作中世紀走向近現代的轉折點。而從強權政治的角度來看，重大轉折點則是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發現」美洲等重大事件。人們同樣也可以認為，近代始於哥白尼（Mikołaj Kopernik, 1473-1543）和新的世界想像；始於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³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89.

⁴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2.

的「新工具」理論取代古典理論；始於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面向自然科學和技術的新政治學。的確，那個時代有不少新生事物，諸如宗派戰爭催生出的國家，開始取代封建社會的公民社會，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心的世界觀，等等。⁵

在歐洲史學中，對於早期近代還有不同時段的細分；根據不同的考察視角，可分為如下幾個時期：文藝復興初期（約1350-1450，也常被視為中世紀晚期）；大航海時代（1415-1531）；宗教改革時期和教會分立（1517-1648）；巴洛克時期（「專制主義」）與啟蒙運動（約1650-1789）；法國大革命或舊制度的終結（1789-1815）。早期近代結束的年代與法國大革命（1789-1799）的時間大致相同，大革命也終結了啟蒙時代。1789年之後，舊制度（Ancien Régime）首先在法國崩潰，後來幾乎在整個歐洲垮塌。1806年，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在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的重創下解體，德語世界的早期近代隨之告終，隨後便進入現代歷史。儘管拿破侖在1814-1815年戰敗後恢復了舊政權，但歐洲在政治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盎格魯－撒克遜學術用語中，「早期近代／現代歷史」（Early Modern History，或譯「近世歷史」），或者論述歐洲時的「早期近代／現代歐洲」（Early Modern Europe，或譯「近世歐洲」），一般是指15世紀至18世紀末的歷史階段。這種分期的依據是，宗教改革至法國大革命的數百年時間，當為文化轉型時代；從特定結構和發展過程來看，它既可與中世紀區分開來，也有別於現代。⁶事實上，歷史分期在歐洲不少地方和北美有諸多細節上的差

⁵ Henning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vol. 3.1, *Die Neuzeit. Von Machiavelli bis zu den großen Revolutionen: Einleitung* (Stuttgart: Metzler, 2006), 1.

⁶ Dagmar Klose and Marco Ladewig, eds, *Die Herausbildung moderner Strukturen i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der Frühen Neuzeit* (Potsdam: Universitätsverlag Potsdam, 2010).

異，在其他大陸更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分期。分期問題不只是純粹的學術問題，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一些意識形態和制度因素。

歐洲中世紀常被稱作「黑暗時代」，其實，很多人對近代早期也所知無幾，那幾乎也是一片黑暗。在許多情況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以及彼時截然不同的生存形式和感知方式。從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的過渡，從近代早期到現代的過渡，時常也未必如前文所示，很難用個別年份來確定，年份和具體事件只是導向標記。時代界限往往是游移的，它會因不同因素而變化，比如是否以政治或社會歷史發展為依據，以及涉及哪些地域和國家。此外，許多歷史發展是長期的，很可能與特定分期相左。仔細考察不同地域之經濟和社會的歷史，就會發現對歷史時期的籠統劃分是不合適的。對於比較史學來說，所謂「客觀分期」，純粹是單一學科或國別史的假設。⁷

施潘根貝格（Hans Spangenberg，1868-1936）在其長文《世界史的各個時期》（1923）中認為，從經濟史、社會史以及基督教社會教義和各種改革運動的角度來看，1500年前後的時期不當被當作一個新時期的初始，而是一個起始於1300年前後的新時期的高潮，這個新時期在1600年左右、甚至到1789年才結幕。⁸不少歷史學家也都認為，人們越來越不把這個時期看作「文藝復興」，更多稱之為「近代早期」。⁹根據某些法律形式，法蘭西的「舊制度」甚至

⁷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4.

⁸ Hans Spangenberg, "Die Perioden der Weltgeschicht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27 (1923): 39-41; Georg von Below, *Über historische Periodisierungen 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enze zwische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1925).

⁹ Ernst 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Tübingen: Mohr, 1922); Dietrich Gerhard, "Periodization in History," in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 ed.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Scribner Sons, 1973), 476-481.

可以算到1918年；而根據政治思想史，「舊制度」的起始時間也已受到質疑。¹⁰康策（Werner Conze，1910-1986）在1957年指出：傳統所言1500年前後的時代轉折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而「革命時代」愈加被視為深刻的轉折點。¹¹1962年，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概述了在他之前不少人提出的觀點，將歐洲「雙重革命」描述為重大歷史轉折點；終結「舊制度」的政治革命和開啟工業化時代的經濟革命，是歷史劇變的顯著標誌。¹²

如前所述，西方史學界不少人認為，近代早期的結束與現代的發端在很大程度上與起始於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和舊制度崩潰的時間大致相同。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則從概念史出發，認為1750年至1850年還有其他一些重要變化；對於這個從近代早期走向現代的過渡時期，他發明了「鞍型期」（德：Sattelzeit；英：saddle period）概念，指稱過渡時期或時代界線。¹³他試圖通過哲學和歷史的關鍵概念，理解那個時代的人的感受。他看到了早期近代進入尾聲之時歷史加速的許多證據，亦即與過去的徹底決裂。其中一個跡象是，「歷史乃人生導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這一傳統箴言在18世紀失效了。未來也不再被視為歷史經驗的延續或變異，而是一片開放、未知的天地；或可援引托

¹⁰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4.

¹¹ Winfried Schulze, " 'Von den großen Anfängen des neuen Welttheaters.' Entwicklung, neuere Ansätze und Aufgaben der Frühneuzeitforschung,"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4 (1993): 7.

¹²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2). 霍布斯鮑姆所言「雙重革命」，是指英國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

¹³ 參見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85-116。

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悲觀說法：「自從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類精神便在黑暗中徘徊。」¹⁴

科塞雷克把「鞍型期」看作現代性的分水嶺。在強調1800年左右之時代轉折的同時，便出現了對1500年前後之巨變的相對化處理。隨後生發的許多設想，要麼對1500年前後的轉折做相對化處理，再從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中分出一個新的時代；要麼繞過或者淡化1500年前後的歷史發展。無論如何，「近代」如此悠長，有時確實讓人覺得有必要進一步細分。另一方面，如此漫長的時段，加之專門研究越來越多，也益發令人難以捉摸。許多發展是在近代早期末端、甚至在近代早期之後才實現了全面突破並取得成果。現代化、理性化、文明化、個性化等進程，極為緩慢、長久且不乏挫折。1500年前後的歐洲，是現代性的前史或者肇始？這也是有些人會提出的問題。

雖然早就有人認為，沿襲的古代—中世紀—近代三項組合不能令人信服，1500年前後的時代轉折也不無理由地受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但我在這篇文章中還是依照世界上「約定俗成」的傳統分期法，以為它依然有其可取之處，不僅便於操作，亦有跡可循。

（二）道不盡的文藝復興

近代是名副其實的新時代，但它不僅是嶄新的，也有返古的特點。近代之始，恰逢舊時代的回歸：文藝復興。作為中世紀與巴洛克之間的藝術和文化史時代，文藝復興是近代發端的標誌。這一發展始於14世紀的義大利，那是古代藝術開始復興之地，或曰文藝復

¹⁴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Über die Auflösung eines Topos im Horizont neuzeitlich bewegter Geschichte," in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39, 47.

興的真正搖籃，15世紀在佛羅倫薩達到第一次輝煌，16世紀初在整個歐洲綻放異彩。一種新的人類形象在歐洲傳播開來，弘揚獨立的個體及其能力。人們在哲學、文學、繪畫、雕塑、建築等諸多領域，重又將目光轉向古代的形式和價值觀。然而，就像文化史書寫中的所有時代劃分一樣，文藝復興的時間確認只是一種建構，一種對於時段的不很明確的導向。文藝復興「之前」和「之後」，過渡不是顯著的。

“Renaissance”（文藝復興）這個法語詞源於拉丁語“renasci”，意思是「重生」或「再次成長」。所謂古代之回歸，即希臘和羅馬古代的重生，或對之進行新的反思，尤其是對其科學和藝術的反思。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1860），¹⁵又在19世紀激發了人們的崇古之情。每當我們說起文藝復興，總會想到宏偉的教堂、非凡的油畫和雕塑傑作，這都要歸功於布克哈特。他探究的主要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文藝復興之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發明」。「文藝復興」一詞原來只是零星出現，直到19世紀，它才在藝術史、文學史和哲學史書寫中越來越多地被用作一種藝術風格的稱謂。

在藝術和文化方面，文藝復興是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時代；鄧斯特布爾（John Dunstable，1390-1453）和德普雷（Josquin Desprez，1450-1521）的時代；拉索（Orlando di Lasso，1530-1594）和帕萊斯特里納（Giovanni da Palestrina，1525-1594）的時代；提香（Tizian，1488-1576）、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和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的時代。尤其是達·芬奇，他是

¹⁵ Jacob Burckhardt, *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Basel: Schweighauser, 1860).

「文藝復興人」的縮影，博學多才：畫家、雕塑家、建築師、解剖學家、工程師、自然哲學家……。

布克哈特廣續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 1798-1874）在其《法蘭西歷史》（1855）中關於文藝復興的論說，¹⁶稱文藝復興為「現代人的母親和故鄉」（“Mutter und Heimat des modernen Menschen”），並用「發現世界和人」（“Entdeckung der Welt und des Menschen”）來定義文藝復興。米什萊想到的是新大陸的發現（哥倫布）、新世界圖景的發現（哥白尼）與新一舊宗教性的發現（馬丁·路德）。布克哈特還加之以個體的發現，見之於偉大的藝術家和他既恨又愛的那個時代的專制君主。在布氏眼中，中世紀的人生活在信仰、幼稚和妄想的面紗之下，而在文藝復興時期，「主體性強勢崛起，人成為精神個體並認識到自我本身。」¹⁷米什萊、尤其是布克哈特成功地將「文藝復興」造就成一個時代概念。換言之，這個時代概念的真正確立並得到認可是在19世紀。

米什萊悉心考察的是法國的文藝復興，他的「文藝復興」概念，不僅在說文學藝術的新風格，也指向一種在中世紀晚期愈加明顯的精神狀態，從而拉開了一個新時代的帷幕。繼之，布克哈特成功地將「文藝復興」確立為一個綜合性時代概念。英國文化史名家伯克（Peter Burke）對布氏觀點的總結是：「雅各布·布克哈特……用兩個概念界定了這個時期：『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現代性』（modernity）。」¹⁸布氏特別重視的是近代個體，著力於勾稽人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發展，並追溯至14世紀。他關於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發現和發展的論

¹⁶ Jules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7: Renaissance* (Paris: Chamerot, 1855).

¹⁷ Johan Huizinga, *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und Realismu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4), 123.

¹⁸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1.

說，較早得到卡西爾（Ernst Cassirer, 1874-1945）的明確支持。¹⁹嗣後，人們常以個體為例，解釋文藝復興的思想和發展。

布克哈特在論說文藝復興時期的個人主義時，聚焦於一種中世紀還不知曉的精神狀態和新的生活態度，這都緣於現代人對自己和世界的新的理解。²⁰人被視為個體、獨立的存在和獨特的個性。人開始思考自己，懷疑舊的世界圖景。在布氏看來，將新的道德亦即新的自我形象轉化為世界觀和對世界的總體理解是必然的，對於人的發現先於對世界的發現，因為人的創造力受到高度重視。實際上是這種精神狀態最終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崛起，人們利用古老遺產來更新科學。²¹布克哈特將文藝復興描述為一個內在機制相互關聯的時代，並開啟了歐洲的現代化進程。的確，文藝復興是一次劃時代的啟航，帶著對人類的新的思考，這一文化現象在後來的啟蒙運動中被再度喚醒。

正是對於古代、中世紀和近代的人文主義歷史定位，才有理由把文藝復興視為取代中世紀的新時代。文藝復興概念不僅有其細化歷史時間順序的作用，也能喚起人們對某種新型人類以及新的文化生產力的認知。儘管迄今的文藝復興研究仍在批判性地審視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概念，但他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還在影響我們對文藝復興的想像。拋開文藝復興與其他思潮的同時性問題，或者它在不同中心城市各具特色的表現，布克哈特關於文藝復興的許多論點是頗為精當的。若無文藝復

¹⁹ Ernst Cassirer, *Individuum und Kosmos in der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 (1927;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7), 37.

²⁰ August Buck, *Die italienische Renaissance aus der Sicht des 20. Jahrhunderts* (Stuttgart: Steiner, 1988), 37.

²¹ August Buck, "Burckhardt und die italienische Renaissance," in *Renaissance und Renaissancismus von Jacob Burckhardt bis Thomas Mann*, ed. August Buck (Tübingen: Niemeyer, 1990), 6.

興，近現代所有源於它或在對它的批判性反思中形成的各種思潮都是不可想像的，它的成就對後世的影響達幾個世紀之久。

文藝復興覆蓋文學、造型藝術和建築等各種藝術和科學領域，但它在不同領域的發展因地域不同而在時間上有所不同，或者伴隨著不同的思潮。尤其在文藝復興早期，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域的13世紀至15世紀還被視為中世紀，這給文藝復興的時代歸屬帶來問題。雖說文藝復興因其文化更新而取代了中世紀，但還在與中世紀同時並進。「文藝復興」概念常常是矛盾的、游移不定的。有人將之描述為一個事件，另有人視之為一個時期，還有人僅把它看作一場運動。伯克認為，很難將持續了幾個世紀的發展趨勢說成單純的事件，這個觀點應該說是在理的。用「文藝復興」概念來囊括整個歐洲在同一時期的一個地方或不同地方的不同發展，確實很困難。²²

科學和美學對古代的研究，發生在不同時期。這種不同時性是歐洲國家沒有共同的「文藝復興」的原因之一，各種古典主義的表現也不一樣，或曰沒有通行的認知。在德意志疆域，宗教改革、遲到且有限的人文主義以及文藝復興差不多同時發生，這是新時代於16世紀初在這裡起步的原因，而這不適用於義大利。16世紀的法國已擁有極為活躍的人文主義，但其古典主義文化卻要記在17世紀的賬上，並且如同西班牙的「黃金年代」（Siglo de Oro），它與文藝復興的關係頗為鬆散。德意志人文主義幾乎與文藝復興無關，在16世紀的蓬勃發展後，直到18世紀後三十年才重又興起。²³

²² Peter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8), 216.

²³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0.

不同時代與古代的關係因時而變，在被稱為「文藝復興」的幾個世紀中也是如此。在這個時代之初，人們認為古人有著無可爭議的優越性，所以提倡仿古，但「模仿」原則後來被「競爭」所取代，人們希望能夠實現甚至超越古代希臘、羅馬的繁榮文化。人們滿懷信心，如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其常被援引、被稱為「文藝復興宣言」的著作《論人的尊嚴》（*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1496）中所言，人本該「過他想過的生活，成為他想做的人」。²⁴然而，走向新世界與許多新發明（望遠鏡、印刷術等），不僅振奮人心，也帶來了不安全感。物換星移，天與地的意義發生了變化。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之後，已經很難再分天上地下。後來，歐洲以宗教的名義廝殺了一百五十年之久，這是一種極富反諷意味的發展，人並不能「過他想過的生活，成為他想做的人」。

任何文化革新的核心悖論是，革新者來自他們力圖改造的文化，彼時的革新者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中世紀人。因此，試圖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之間劃出明晰的時代界線，似乎並不理想。文藝復興早期的文化與中世紀晚期的歐洲文化並存共在。²⁵當今的歷史學家們基本上也認為，文藝復興時代很可能並不純粹，它承襲的中世紀特色遠超人們曾經長期想像的那樣。伯克便強調了中世紀傳統的「延續」，強調了古典形式和價值觀對義大利及歐洲其他地區之新的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創造性適應過程。

²⁴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Über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1496, trans. Herbert W. Rüssel (Zürich: Manesse, 1988), 11. 米蘭多拉的人生短暫，因其從未得到教皇允許的演講「論人的尊嚴」而聞名。他提出了人的本質和地位問題，強調意志自由是人的特徵；對於人性的這種理解，深深地植根於基督教傳統。此作被收錄於1496年出版的米蘭多拉遺作集，16世紀的一些出版商將之命名為*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論人的尊嚴》）。

²⁵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35.

近代對政治思想的闡釋者提出了巨大挑戰，這是因為新與舊往往令人困惑地混合在一起。何為仿古？何為創新？這在文藝復興時期已經很難分清，崇古和對人類創造力的信念同時並存。文藝復興既與近代的開端又與古代文化之復興聯繫在一起，這已成為清晰而固定的觀念。還有許多人認為，宗教改革標誌著近代之始，可它亦可被看作返古的嘗試，即回歸原始基督教。不是要到17世紀，即「古今之爭」爆發之時，而是在這之前，早就有了尚古者與崇今者之間的爭吵。在整個近代，古老的共和主義思潮（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為其最著名者）與現代自由主義思潮（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為其代表）之間一直有著競爭關係。²⁶

古代重又回歸近代，這興許對尚古者來說是一種慰藉。人文主義也隨著文藝復興而回歸，並在近代一再以新的形式出現。²⁷文學人文主義已經始於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然而，近代的崇新激情前所未有，且滲透進了所有思維。人們開始厭惡落後的中世紀，因而回望古代，古代就這樣「重生」了。自美國、法國的兩大革命撞開了現代性的大門之後，強烈的開端之感已經不可抗拒。「新」理應比「舊」好，但是反向思維也未必荒謬：舊事物是已知的、經受了考驗的，而新事物還得看其表現。在法國大革命這一現代政治思維的聚焦點，進步與保守勢不兩立。作為對進步主義的回應，保守主義出現了，這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現代性現象。²⁸

20世紀初，荷蘭歷史學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提醒人們，應避免對於文藝復興的片面看法，因為個人主

²⁶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vol. 3.1: 1.

²⁷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vol. 3.1: 1.

²⁸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vol. 3.1: 1-2.

義畢竟不是貫穿文藝復興的唯一主題。²⁹他也反對過分強調義大利人在文藝復興中的先鋒角色，認為布克哈特明顯的不足之處是將義大利與歐洲北方之文藝復興的發展截然分開。³⁰伯克也認為，假設義大利為15世紀新式文化生產的中心，歐洲其他地區只是圍繞中心的邊緣，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15世紀，實際上有兩個不同的文化中心在同時發展，一個在義大利北部，另一個在荷蘭南部，位於當時歐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對於歐洲大部分地區來說，15世紀的勃艮第（Bourgogne）宮廷是文化旗幟。³¹佛蘭德（Flanders）地區的文化運動在域外的影響力，絲毫不遜色於義大利。文化交流促進了文藝復興在藝術方面的進一步發展，並傳播至巴黎、科隆和布拉格的人文主義圈子。另一方面，也不能低估從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傳播到整個歐洲大陸的思想、科學、經濟和文化創新和成就的重要性，尤其是對古代思想和形式的重新發現和傳播，引動了歐洲對義大利文化的反響。³²伯克的差異化觀察對於今天理解文藝復興這個文化時代至關重要。

晚近的文藝復興研究，多半不再局限於對個體的考察；20世紀末以來，人們更多關注文藝復興的文化思想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影響；查考文藝復興的接受，與其他文化現象的互動，以及如何逐漸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³³伯克指出，除了需要在時間上做出先後排序之外，沒有顯證表明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之間存在明確的時代界限；因此，他把涵蓋那個時代歐洲文化史的文藝復興稱為「文化運動的歷史」，而不是把它當作一個時代。³⁴

²⁹ Huizinga, *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52.

³⁰ Huizinga, *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25-26.

³¹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75.

³²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75.

³³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23-24.

³⁴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13.

無論如何，布克哈特的觀點被意識形態化、得到補充或相對化處理，但從未被全新的文藝復興形象替代。³⁵從思想史來看，布氏在義大利文藝復興中發現的東西，後來很容易在整個歐洲找到，從布里丹（Jean Buridan，1292-1363）到鹿特丹的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1536），³⁶由此才出現了整體性文藝復興概念。雖說布氏對文藝復興的敘寫僅集中於義大利，但他也看到了文藝復興之於世界史發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伯克等當代文藝復興研究者強調了義大利以外的歐洲中心城市對於文藝復興的重大影響，³⁷這種見解也有其模糊之處：既指向古代和「中世紀傳統的延續」，又聲稱新時代的起點，如何才能在時空上做出有效界說？這也是一個難題。

（三）近代「新」在哪裡？

科塞雷克在其概念史研究中，對漢語譯之為「近代」的德語複合詞“Neuzeit”做過分析，該詞由形容詞「新」（neu）與名詞「時代」（Zeit）組合而成。在18世紀以降的德語史學著述中，「新的時代」（neue Zeit）的說法日漸頻繁，另有「較新的時代」（neuere Zeit）之說，它們在經歷漫長歲月之後才變成複合詞「新時代」（Neuzeit）亦即「近代」。根據斯時《格林辭典》（*Grimms Wörterbuch: Deutsches Wörterbuch*）中的說法，

³⁵ Evert Maarten Janssen, *Jacob Burckhardt und die Renaissance* (Assen: Van Gorcum, 1970), 1.

³⁶ Enno Rudolph, “Wußte die Renaissance, daß es sie gab? Elemente einer vormodern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in der Renaissance,” in *Die Renaissance und ihr Bild in der Geschichte*, ed. Enno Rudolph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8), 2-5.

³⁷ Peter Burk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420-1540* (London: Batsford, 1972); idem, *The Renaissance*; idem,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Neuzeit”這個簡潔的複合詞是1870年才開始有人使用的，且出自德國詩人弗賴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之口，「他是要以此概括已經走過四百年路程的整個時代。」³⁸晚近的研究表明，德意志歷史學家塞拉留斯（Christoph Cellarius，1638-1707）當為第一個將「新時代」（Neuzeit）概念用於劃分普遍歷史的人。³⁹德語「新時代」（「近代」）的構詞可能借鑒了「新世界」（Neuwelt）這個較老的概念，早在16世紀初就有短語「新世界」（Newe Weldte）的說法。⁴⁰而就詞語而言，“Neuzeit/近代”在19世紀晚期才流傳開來，而且不與其他歐洲語言中的“historia nova”、“temps modernes”、“modern times”相對應。⁴¹

科塞雷克在1989年的演說《新時代有多新？》中說，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而他隨後即說：這個概念本身就告訴我們，新時代（近代）是新的：

如果翻閱教科書和專業手冊，我們會在相應段落中見到清楚的答案。據說有一位修道士，曾將九十五條論綱固定在維滕貝格的教堂門上，申斥教廷的贖罪券。有些博學的讀書人和人文主義者，好奇地沈浸於古文本，做編校和點評。有一個人發明了印刷機，方便了人們的閱讀。一個有使命感的勇敢的水手，意外地發現了美洲；不久之後，另

³⁸ Reinhart Koselleck, “‘Neuzeit’: Zur Semantik moderner Bewegungsbegriffe,” in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302-303.

³⁹ Walter Achilles, *Landwirtschaf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nzyklopädie deutscher Geschichte*, vol. 10 (München: Oldenbourg, 1991), 1.

⁴⁰ Hermann Braun, “Wel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 7, ed.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2), 451.

⁴¹ Reinhart Koselleck, “‘Neuzeit,’” 303.

一個水手在球形的海面上航行。一位天文學家或占星家，將這個球變成了一顆繞太陽運行的行星。這些1500年前後闖入傳統經驗空間的新鮮事兒，確實聞所未聞。⁴²

一種頗為普遍的看法是，宗教改革和新教教義（尤其在德意志疆域）已經與中世紀徹底決裂，或曰中世紀的終結和近代的肇端。若假設任何特定時期都只有一種歷史驅動力在起主導作用，那麼宗教改革的起始，當為文藝復興的收場，雖則仍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文藝復興在很多方面還持續了一百年之久。古騰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極大地助推了宗教改革的宣揚和突破（《古騰堡聖經》的印刷可以追溯至1455年）。印刷機的發明，徹底改變了傳播方式，不僅成為宗教改革的推動力量，也增進了知識的積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發表於1517年的《九十五條論綱》，依託的是對希臘語和希伯來語《聖經》來源的精準鉤稽，即前一個世紀人文主義者的知識儲備。

大航海時代的最早動力來自葡萄牙：自1415年起，航海家亨利王子（Infante Dom Henrique, 1394-1460）就派出探險隊，尋找通往印度的海路（印度貿易）。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9-1524）於1498年實現了這一目標。所謂哥倫布1492年「意外地發現了美洲」，說的是哥倫布一生都堅信，他在西線發現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就此而言，他發現的並非另一個世界，而是一條新航線上的舊世界。因此，美洲在16世紀初的地圖上被納入亞洲，成為舊世界的一部分。儘管如此，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發現，改變並拓展了中世紀人的世界觀，也導致歐洲的全球擴張。

⁴² Reinhart Koselleck, "Wie neu ist die Neuzei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1 (1990): 539-540.

總的說來，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被視為轉折之始。這個概念在義大利是指13世紀末或14世紀初至16世紀末的時代；而在歐洲其他地區，「文藝復興」主要涵蓋16世紀。西方與拜占庭、猶太和阿拉伯學者之間的接觸，也助長了古代的復興。⁴³16世紀是從中世紀進入近代的真正啟程，帶著歷史和社會巨變，所有科學和藝術也都充滿開創精神，尤其體現於各種發明和地理發現，如布克哈特所言：「人們發現了各種新的世界，在舊世界中不再感到自在。」⁴⁴

人文主義可謂文藝復興的理論基石。早在1341年，早期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面對古羅馬的廢墟，就對時代作了新舊比較，非難剛過去的「黑暗」時代——「黑暗的中世紀」之老生常談，在他那裡初見端倪。1469年，義大利主教布西（Giovanni Andrea Bussi, 1417-1475）就已區分「古代」（antike）「中世」（media tempestas）和「我們的時代」（nostra tempora），他已有生活在新時代的感受。⁴⁵此說的意義在於，生活在15、16世紀之交的人已有自己的時代意識，而中世紀缺乏這種意識。對於近代之前的人來說，一切早已注定，而且不言而喻：宇宙，上帝，無法更改的傳統和社會機制。⁴⁶

⁴³ Buck, "Burckhardt und die italienische Renaissance," 5-12;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Horst Günther, "Renaissance," in *HWPPh*, vol. 8, ed.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84), 783-790; Wolfgang Hardtwig, "Jacob Burckhardts *Kultur der Renaissance* und Max Webers *Protestantische Ethik*. Ein Vergleich," in *Renaissance und Renaissanceismus von Jacob Burckhardt bis Thomas Mann*, ed. August Buck (Tübingen: Niemeyer, 1990), 13-23.

⁴⁴ Jacob Burckhardt, *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Stuttgart: Kröner, 1958), 127.

⁴⁵ Erich Meuthen, *Das 15. Jahrhundert* (München: Oldenbourg, 1984), 160-162.

⁴⁶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vol. 3.1: 2.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費奇諾（Marsilio Ficino，1433-1499）在1491年指出，薄伽丘曾隱約見到古代繁榮、基督教衰落和文藝復興之三大時代，這種歷史觀在費奇諾生活的時代已經昭然若揭：「我們這個時代猶如黃金時代，讓幾乎絕跡的自由的學術重見天日。」⁴⁷這種觀點在15、16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逐漸固定下來，人文主義者熱衷於古代文化的「重生」或「復興」，從事人文研究的學者多把目光轉向語法、修辭學、詩學、歷史學和道德哲學。⁴⁸文藝復興將古代與現代塑造成世界史之兩大對立，並以「永恆羅馬」之衰敗及其在自身文化中的重生為依據，又激活了古代歷史觀中的自然循環說。然而，人文主義歷史哲學的循環說，在模仿與超越古代榜樣之間留有足夠的空間，它是創造性模仿的範例。⁴⁹

自16世紀起，哲學著作的標題就明顯體現出「新」之品質；帕特里齊（Francesco Patrizi，1529-1597）著有《普通哲學新論》（*Nova de universo philosophia*，1591），培根著有《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莫霍夫（Daniel Morhof，1639-1691）在其著名的《文獻要目總覽》（*Polyhistor, literarius, philosophicus et practicus*，1688-1692）中，將不少作者（包括帕特里齊和培根）列為哲學和物理學的「創新者」（*novatores*）。莫霍夫所說之「新」，不是在說當代哲學和科學，而是指新型的哲學和科學。⁵⁰

⁴⁷ Marsilio Ficino, quoted in Hans-Ulrich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 4, ed.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98. Marsilio Ficino, *Opera* (Firenze: Antonio Miscomini, 1491; Venezia: Aldo Manuzio, 1516; Basel: Henricus Petrus, 1561).

⁴⁸ Meuthen, *Das 15. Jahrhundert*, 160-162.

⁴⁹ Hans Robert Jauf, "Antiqui/moderni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in *HWPPh*, vol. 1, ed.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84), 412.

⁵⁰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5.

關於新時代之獨特性的思考，最遲在16世紀末就已開始。對於法國新教學者拉波普利尼埃爾（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1541-1608）來說，特別是新的科學技術成就（新物理學、各種發現、印刷術、火炮的使用以及帕拉塞爾蘇斯的醫學），使這個接近尾聲的世紀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⁵¹德意志歷史學家黑倫（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1760-1842）相信，17世紀以降，人們基本上已經認識到「幾個重大事件的匯合」，「對歐洲產生了政治影響」，包括君士坦丁堡的淪陷、發現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群島的海路，以及由此產生的世界貿易的變化，還有「步槍的使用，改變了戰爭藝術」。⁵²這裡所說的觀點，自17世紀起已經頗為常見。⁵³

也是在17世紀，法國發生了「古今之爭」。在其濫觴階段，爭議還很少關注對藝術作品的評價，更多地涉及新科學思維的原則、哲學懷疑的方法和物理知識的意義。⁵⁴不只是個別權威、而是權威本身受到「新派」的質疑。⁵⁵並且，鬥爭的鋒芒不僅指向聖書和教會的權威，也針對古代經典作家的權威與所有古代規範形式。⁵⁶這一切也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念，如培根所說，古代「對於我們來說雖是較老，從世界自身說來卻是較幼的」；⁵⁷換言之，古代乃人類幼年，當代世界比古代老得多。因此，「古老」之傳承概念被「編

⁵¹ 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 *L'Histoire des histoires* (Paris: Marc Orry, 1599).

⁵² 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und seiner Colonien*, vol. 1 (Göttingen: Röwer, 1809), 7.

⁵³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1-792.

⁵⁴ William von Leyden, "Antiquity and Authority: A Paradox in Renaissance Theor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 (1958): 473-492; Hans Baron, "The Querelle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as a Problem for Renaissance Scholarship,"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 (1959): 3-22.

⁵⁵ Leyden, "Antiquity and Authority," 473-492.

⁵⁶ Horst Günther, *Freiheit, Herrschaft und Geschichte: Semantik der historisch-politischen Welt*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217-219.

⁵⁷ 培根著，許寶騷譯：《新工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67。

年史」的客觀概念所取代。現代人不僅再次拾起培根的格言「時之古代，世之青年」（“antiquitas sæculi juventus mundi”），而且還借助哥白尼在培根和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之前已經在方法論上獲得的、世代相傳的對於自然的逐步認識，並將之應用於整個文化領域。

「近代」若是沒有明確地用作「古代」或「中世紀」的反義詞，便可用來論說晚近歷史及其現象，表示現代性或現實性。然而，「近代」常被用作反義概念亦即分期概念。在各種語境中，尤其在文化史語境中，作為反義概念的「近代」獲得了新的理想型功能。新時代的特徵不是過去某個時代的更新或再生，而是某種可能帶來進步或者危害的變化。⁵⁸在現代性勃發之前，整體漸進之世界的觀念已經形成。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深得其意，但他還沒能從這個視角觀察塵世和歷史，只是以此發展了他的數學模型。是否可以懷疑通行的法則，將目光從封閉的世界轉向無限的宇宙，以及自由意識的發展是否能同技術的進步與人類在全球的擴張行為合轍，或者人類的自我毀滅是否已經開始，這些都是人們在18世紀中期之後急切並反覆尋思的問題。⁵⁹

德意志哲學史家布魯克（Jakob Brucker，1696-1770）在其《哲學史的最初起因》（*Erste Anfangsgründe der Philosophischen Geschichte*，1736）中，探尋了中世紀的情形：「可憐的哲學一直都是那樣的嗎？」他的回答是：「不。在14和15世紀，神聖的旨意喚醒了一些大師，衰敗、發霉的科學很讓他們痛心，他們努力尋找排除禍害的方法。」布魯克對晚近時代哲學家的看法是，他們要麼是復古派，要麼對哲學做「折衷的改進」，這只發生在偉大的創新者那裡，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獲得了「哲學革新

⁵⁸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3.

⁵⁹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5.

者」(Reformator Philosophiae)之殊榮。⁶⁰

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在其歷史講座中,深刻地總結了19世紀出現的歷史觀,而在介紹自己對「世界歷史」的思考時,他審慎地避開了流行的時代劃分。⁶¹他認為新近歷史與古代歷史的不同之處,首先「在於事件的地點,發生在有許多偉大人物登場的國家」。若說古代歷史基本上僅限於「地中海沿岸」,但在中世紀,「事件發生地轉向四面八方」,所有國家都「建立了聯繫。這造就了中世紀的特性和世界觀,一切都已發生並還在發生」。新近歷史最終涵蓋了「整個世界」。⁶²

科塞雷克指出:「回顧1500年前後以降的發展歷程,能夠見出新的時代、新的歷史概念緩慢卻很成功地確立起來了。在啟蒙時代,人們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與所謂中世紀、所謂古代完全不同的新時期,並學會了對過去的批判性回顧和歷史反思。『新的時代』、『新的歷史』已經成為教科書知識。但如我們所知,一切並不停留於此,時代變得越來越新。」⁶³1787年,也就是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前夜,史學教授克斯特爾(Heinrich Köster, 1734-1802)已在《德意志百科全書》的「歷史」條目中寫道:「幾乎整個歐洲都已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在世界上,我們所能想到的地區幾乎出現了新的人種。」⁶⁴

科塞雷克總結說:在法國大革命前夕,「『新時代』(neue Zeit)又新添了『最新時代』(neueste Zeit)之說。作為新的時代

⁶⁰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6.

⁶¹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2.

⁶² Leopold von Ranke, quoted in Günther,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792.

⁶³ Koselleck, "Wie neu ist die Neuzeit?," 540.

⁶⁴ Heinrich Köster, "Historie," in *Deutsche Encyclopädie, oder Allgemeines Real-Wörterbuch aller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 vol. 12 (Frankfurt: Varrentrapp (Sohn) und Wenner, 1778-1804), 657.

感受的表徵，這種對最新時代的概念化是不應被低估的。1770年左右的『新』的意思是，人們不再像中世紀那樣，用回看過去的方式來界定一個時期的終了，而是看到自己正身處一個新時期的肇端，並很快把這一認識化為概念。未來已被開啟，自主的人類……準備在進步的意義上主導未來，或如時人開始說的那樣：創造歷史」。⁶⁵在科氏看來，新時代催生出最新時代，這就有了進步之「重複」。身處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的新的歷史之地位也就發生了變化，從1500年前後移到1800年前後。於是，新的歷史被相對化，還有比它「更新的歷史」，且不僅與中世紀比，還與自己身在其中的近代比。⁶⁶

二、古今對觀與古今之爭以及關於現代性意識的歷史哲學思考

（一）「古今之爭」：坐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17、18世紀，圍繞古今何者更勝的問題，歐洲知識界掀起了一場持續百餘年的論戰，史稱「古今之爭」。它常被視為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間的重大文化思想史事件，或曰西方近代極具里程碑意義的文化事件。這場文人之戰發端於17世紀早期的義大利，⁶⁷主戰場則在法國和英國，尤以法國古典主義時期的「古今之爭」（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著稱，並在17世紀晚期達

⁶⁵ Koselleck, "Wie neu ist die Neuzeit?," 541.

⁶⁶ Koselleck, "Wie neu ist die Neuzeit?," 541.

⁶⁷ 較早的事件是義大利詩人、史學家塔索尼（Alessandro Tassoni, 1565-1635）發表《雜見》（*Pensées diverses*, 1620），他的古今對比所得出的結論是：今人在各方面都勝過古人。此論引起軒然大波，拉開了文人之戰的帷幕。不久，塔氏著作被博杜安（Jean Baudoin, 1590-1650）譯介到法國，引發了類似的論爭。（按照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的說法，義大利的古今之爭已見於文藝復興初期，斷斷續續持續了三個世紀。）

到高潮。標誌性事件發生在1687年1月27日：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康復之際，法蘭西學院院士齊聚一堂，佩羅（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當眾朗誦了他的詩作〈路易大帝的世紀〉（“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頌揚路易十四時代是一個理想的時代，並質疑羅馬帝國奧古斯都時代的典範意義。佩羅以此拉開了敵對行動的帷幕，法蘭西學院隨即分裂為對立的兩派：以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為首的崇古派（les anciens）和以佩羅、豐特奈爾（Bernard Fontenelle，1657-1757）為代表的厚今派（les modernes）。當時法國的飽學之士幾乎都被捲入這場論爭，雙方圍繞古人和今人孰高孰低、人類在進化還是退步等問題而激烈爭辯，且持續了二十多年之久。

法國文學界的古今之爭由來已久，從1637年到1674年，現代文學的擁護者已站出來反對「古代」亦即法國古典主義文學。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的《熙德》（*Le Cid*，1637）引起軒然大波：「現代派」指責他有違愛國主義和基督教道德。1663年和1667年，「現代派」又開始攻擊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的《太太學堂》（*L'École des femmes*，1662）和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的《昂朵馬格》（*Andromaque*，1667），指責他們有失體統，給法國社會樹立了不良的英雄形象。厚今派幹將聖索爾蘭（Desmarets de Saint-Sorlin，1595-1676）在許多論爭性著述中指出，基督教傳說遠比古代神話真實，現代法國文學只有同時也是基督教文學才符合時代的要求。這種觀點招致布瓦洛的非議，他在《詩藝》（*L'Art poétique*，1674）中嘲笑聖索爾蘭的構想，贊揚古代的神話世界。

針鋒相對的觀點在17、18世紀之交的文學思想之爭中尤為激

烈。爭論的焦點是今人的知識是否已經超越古代希臘人、羅馬人的知識，古代在多大程度上還可以堪當後世的楷模。現代派的立場是，現代人比古人看得更遠，現代科學和理性時代優於古代迷信、狹隘的世界。崇古者則認為，人們所要知道的一切都已見於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70-19BC）、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荷馬（Ὅμηρος/Homer，9th century?-8th centuryBC），尤其是亞里士多德（Ἀριστοτέλης/Aristotle，384-322BC）。此前，聖索爾蘭臨終時曾囑託佩羅成為他的思想繼承人，守護基督教意義上的現代文學。佩羅不辱使命，在其宣言式的《路易大帝的世紀》中宣稱，現代作家並不比古代希臘羅馬作家遜色。⁶⁸

佩羅認為，笛卡爾和哥白尼以降的科學在當代的優先地位，理當要有符合這個時代的更完美的藝術與之匹配。由此可見，在文藝復興時期，循環歷史觀取代了中世紀的類型觀，於今又被歷史進步論取而代之。這種不受中世紀救贖觀念主導的新思維，充分體現於佩羅的代表作、四卷本《古今對觀》（1688-1697）。⁶⁹ 這套對話體著作基本上體現了厚今派的主要思想，重覆了對古人的攻擊，令崇古派大怒，也使論戰變得更為激烈。厚今派的思想中充滿進步史觀和對自然科學的信心，認為古人不及今人，伽利略、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物理學遠超古代科學。在《古今對觀》的末尾，佩羅大發感慨：

讀一讀法國和英國出版的雜誌，看一眼這些偉大王國的研究院所出版的書籍，便可深信不疑地認為，自然科學在過去二十或三十年內的發現，比整個古代的學術發現還要多。我

⁶⁸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Wikipédia, accessed September 2, 2024, https://fr.wikipedia.org/wiki/Querelle_des_Anciens_et_des_Modernes.

⁶⁹ Charles Perrault, *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en ce qui regarde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 ed. Hans Robert Jauß (München: Eidos, 1964).

覺得自己很幸運，看到了我們所享受的幸福，〔……〕縱覽過去的所有時代，目睹事物的誕生和進步，這是莫大的快樂。不過，那些現今尚未獲得新的增長和光澤的東西，則另當別論。我們的時代差不多已經達到完美的巔峰。⁷⁰

佩羅的古今對觀，將世界時代與人類年紀作對比：經過青年時期（古代）以及作為生命中期的人文復興時期（他未考慮中世紀這一「黑暗的過渡時期」），人類已進入老年階段，這在他眼中是成熟階段，而當代則是歷史發展的完美實現。⁷¹

佩羅的論證思路是通過大量比較來彰顯「現代」在所有科學和藝術領域的優越性，這也見於整個古今之爭的演進過程。厚今薄古者很懂得反證法，根據法國古典主義準則，貶低荷馬等古代藝術作品，以顯示「完美性」（*perfectibilité*）原則之於藝術的有效性，並宣稱藝術只能根據本時代的品位來評判。然而，好古者的立場又使趨新者不得不承認，古人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不能以時代的發展程度論之，它們有其自身價值；古今藝術之間的差異以及自然科學的進步，不能與時代發展進程相提並論。其實，這也是兩個陣營在古今之爭收場時的共識，給重新評估歷史中各種不同的時代狀況提供了可能性。從當時公眾的反應來看，厚今派彷彿贏得了古今之爭的最後勝利，而實際上這場論爭無所謂勝負，論辯只是逐漸偃旗息鼓，而全面的理論思考要到18、19世紀之交才出現，進入眾人的時代意識更是晚得多。⁷²

⁷⁰ 佩羅，轉引自約翰·伯瑞著，范祥濤譯：《進步的觀念》（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頁62。（譯文略有改動）

⁷¹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99-100.

⁷² Hans Robert Jauf, "Ästhetische Normen und geschichtliche Reflexion in der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in *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en ce qui regarde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 by Charles Perrault, ed. Hans Robert Jauf (München: Eidos, 1964), 8-64.

厚今薄古在很大程度上是當代進步理念在文學上的反映，所以在古今之爭基本收場之後，它的推動力仍在啟蒙運動的相關討論中發揮作用，甚至一再啟發人們返回古今問題，且一直延續至浪漫主義時期，這讓人看到一定程度的歷史延續性。法國的古今之爭與歐洲在這個問題上悠久的論爭傳統結構相仿，法國「現代派」在1687年挑起的古今之爭，在歐洲有不少先例可援，如在文藝復興時期，伽利略在《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 tolemaico e copernicano*, 1632）中嘲笑亞里士多德的權威。正因為此，佩羅－布瓦洛之爭很快就在法國境外廣為人知，並以適合各自情境的形式表現出來。

還在法蘭西學院的兩派文人對壘期間，崇古的英國政治家和作家坦普爾（William Temple, 1628-1699）便發表〈論古今學術〉（“An Essay upo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 1690）一文，回應豐特奈爾的〈註解古代與現代〉（“Digression sur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 1688），將這場爭論引入英國。在坦普爾眼中，現代人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古人對自然有著清晰的認識，現代人只是完善了先人的見解。1694年，批評家沃頓（William Wotton, 1666-1727）為文《對古今學術的反思》（*Reflections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提出與坦普爾相反的觀點。於是，古今之爭在英國上演。與沃頓一樣，古典學家、批評家、神學家本特利（Richard Bentley, 1662-1742）和18世紀英國最偉大的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站在「現代派」一邊。牛頓則贊賞古人，反對博學家、實驗科學家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擁護新潮。牛頓說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前人成就，並贊同坦普爾之說：「若說我看得更遠，那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著名比喻「我們是坐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為的是比他們看得更多、更遠」，出自法國早期經院哲學家和學者沙特爾（Bernard de Chartres, ?-1130?）。此說具有指導性意

義：既欽佩古代的偉大導師，又對基督教當代的進步表示敬意。⁷³

坦普爾的秘書、後來成為諷刺文學大師的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於1704年發表短篇諷刺作品《書籍之戰》，描繪了國王圖書館中古今書籍之間的激烈鬥爭，⁷⁴各種思想為爭奪主導地位而戰，其中許多人物都出自坦氏文章。他跟隨坦普爾近十年，這也是英國文人之戰的時間，「書籍之戰」（Battle of the Books）因而成為英國古今之爭的代名詞。⁷⁵

古今之爭的一個重要且持久的思想成果是激發了人們的批判精神，展示出反思和挑戰古代權威的勇氣。即便爭執已成往事，但後來人還會時不時回歸古今之辯。與原先法國的古今之爭不同，後來的爭論更多歷史哲學色彩。⁷⁶法國「古今之爭」因布瓦洛的追隨者、著名德國哲學家 and 文學評論家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而在德意志疆域得到傳播。但就德意志古典主義的開端而言，對法國「古今之爭」之成果的關鍵性接受是在溫克爾曼（Johann Winckelmann, 1717-1768）那裡才實現的，⁷⁷特別是他在《關於模仿希臘繪畫與雕刻藝術作品的思考》（簡稱《希臘美術模仿論》，1755）⁷⁸中對相關問題的思考。18世紀中期，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也重提古今之爭問題。18世紀末，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⁷³ Jauß, “Antiqui/moderni,” 412.

⁷⁴ 原作全名：*Full and True Account of the Battle Fought last Friday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Books in St. James's Library.*

⁷⁵ Wikipédi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⁷⁶ Günter Blamberger, “Moderne,” in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vol. 2, ed. George Braungart et al. (Berlin: de Gruyter, 2007), 621.

⁷⁷ Jauß, “Antiqui/moderni,” 413.

⁷⁸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Gedanc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hlerey und Bildhauer-Kunst* (Friedrichstadt: Hagenmüller, 1755).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和弗·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的著述中也都論及這個話題。在整個18世紀，「古代」問題始終見於德意志美學爭論；然而，啟蒙時代的話語形態和受到特定旨趣引導的「古代」論題，明顯區別於法國古典主義。⁷⁹

（二）「古今之爭」遲到的回聲：德意志哲人關於古代與現代的歷史哲學思考

文藝復興以降，直至17世紀晚期震動文學藝術界的古今之爭，厚古薄今亦即尊古、仿古的風氣在法國始終占據上風。特別是在古典主義盛行之時，尊古卑今是毋庸置疑的。雖則厚今派恍若取得了古今之爭的最後勝利，但弔詭的是，後來的事實表明，崇古派領袖布瓦洛是正確的，他的所有預言都成真了：荷馬和維吉爾依然受到推崇，被布瓦洛譽為天才的17世紀作家得到後人的景仰：哲學領域有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和笛卡爾，戲劇中有喜劇作家莫里哀，悲劇作家高乃依和拉辛。與此相反，佩羅曾堅稱，他的摯友、法國詩人和法蘭西學院院士吉諾（Philippe Quinault，1635-1688）有朝一日會被全世界公認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他還斷言《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將被後人遺忘，將被基督教史詩取而代之，其中有他自己的作品。顯然，他的預測基本上都落空了。⁸⁰此外，古今之爭在新時代認識方面的理論開拓，一個多世紀都未融入集體經驗，只在個別情況下有所體現，而古代範式取向一直延續至啟蒙時代末期。

⁷⁹ Marlene Meuer, *Polarisierungen der Antike: Antike und Abendland im Widerstreit—Modellierungen eines Kulturkonflikts im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 (Heidelberg: Winter, 2017).

⁸⁰ Wikipédi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厚今派的得勢雖為表面現象，卻是即將來臨的18世紀啟蒙思潮的預兆，不少人直接視之為啟蒙運動的開端。即便古今之爭的成果在18世紀尚未廣泛進入時人新的時代意識，但它們改變了許多啟蒙思想家和作家與過去時代的關係。早在1714年，費內隆（François Fénelon, 1651-1715）就要求史學亦當從事中世紀研究，它已被看成具有獨立時代地位的「古代之現代」（*antiquité moderne*）。⁸¹ 伏爾泰在其《哲學辭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1764）中的〈古代與現代〉（“Anciens et modernes”）一文中，雖然承認所有時代的人都同樣有才華，卻認為現代文學不如古代文學；在他看來，法語的發展史只是凱爾特人可怕的行話與腐朽的拉丁語的雜燴。然而，對於當代語言的非難，並未阻礙伏爾泰自豪地指出現代自然科學的百項成就，且為古人想都不敢想的。他既贊揚又責備的基本態度，亦體現於該文最後的言辭：「凡是擺脫一切成見，體會到古人和今人的才德，鑒賞他們的美，認識他們的缺點，並能加以原諒的人都是幸福的。」⁸²

啟蒙運動拉開序幕之後，「現代」（modern）一詞被賦予「新」之含義，而且日漸時興，被用來指稱因其內在價值而得到認可的目前時代。⁸³ 啟蒙時代的新的歷史觀，緣於對尚古導向的抗議，而這種導向從文藝復興初期到18世紀初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啟蒙思想家的當代意識是現代性與古代意識分離的第一步。溫克爾曼所發展的風格史（風格分期）以及新原則，很可能源自法國早期啟蒙主義者的見解，即不同時代的藝術獨特性有其社會歷史原因。然

⁸¹ François de Fénelon, quoted in Hans Robert Jauf, “Literarische Tradition und gegenwärtiges Bewußtsein der Modernität” (1965), in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41.

⁸² 伏爾泰著，王燕生譯：《哲學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118。

⁸³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99-100.

而，溫氏古典主義立場的內在矛盾是，他既賞識希臘藝術的歷史地理獨特性，又為現代藝術確定了目標；他堅信模仿古代「是我們變得偉大的唯一途徑，如可能的話，還會無與倫比」。⁸⁴溫氏觀點引發了赫爾德、弗·施萊格爾和席勒對於文學藝術的歷史哲學思考。⁸⁵

赫爾德拒絕對古代藝術的複製和模仿，在他看來，古代與現代似乎不存在等級差異。但他建議人們回望古代，認為這對創造性活動頗有裨益。⁸⁶如此，他以新的方式將歷史考察與當代審美實踐聯繫起來。赫爾德首先感興趣的是，何為不同時代變化的歷史規律。他不只是基於對發展的自身規律的認識得出結論，還對發展規律的時代序列之結構進行歷史哲學思考。直到此時，也就是古今之爭結束整整半個世紀之後，其成果才真正轉化為對當代與古代、中世紀之間關係的全面重新定義。⁸⁷

姚斯（Hans Robert Jauß, 1921-1997）在其〈施萊格爾和席勒對「古今之爭」的回應〉（1967）⁸⁸一文中，根據1795年底、1796年初問世的兩篇名文，即席勒的〈論素樸文學與感傷文學〉（“Ue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和弗·施萊格爾的〈論希臘文學研究〉（“Ue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詳細討論了二者如何回應赫爾德提出的不同時代的變

⁸⁴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Kunsttheoretische Schriften*, vol. 1 (Baden-Baden/Strasbourg: Heitz, 1962), 3; Hans Robert Jauß, “Schlegels und Schillers Replik auf die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in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80-81.

⁸⁵ Hans Robert Jauß, “Antiqui/moderni,” 413.

⁸⁶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Ue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teratur” (1767), in *Sämmtliche Werke*, vol. 1, ed. Bernhard Suphan (Berlin: Weidmann, 1877), 383.

⁸⁷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104-105.

⁸⁸ Jauß, “Schlegels und Schillers Replik auf die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67-106.

化規律問題。⁸⁹無論是弗·施萊格爾還是席勒，都試圖在與古代的對照中界定現代的內在價值。席勒提出了著名的素樸文學和感傷文學之區分；與此異曲同工，施萊格爾對於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基本判斷，分別是「自然的」與「人為的」，此乃兩個時代的基本特徵。席勒幾乎在發表〈論素樸文學與感傷文學〉的同時，在寫作於1793/94年，1795年改寫並結稿付梓的《美育書簡》中，⁹⁰亦涉及類似問題：有了現代文學與再現自然、完美生活的古代文學的對照，我們現在要努力通過克服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感性生活與精神生活、個性與國家秩序之間的異化，走向完美之人。

席勒、弗·施萊格爾二人從歷史哲學視角對古代和現代各自內在價值的界定，為時人徹底擺脫古代範式的羈絆創造了決定性條件。⁹¹威廉·封·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在評說席勒理論時，展現出明顯的厚今薄古傾向。他強調指出，感傷文學所追求的目標比素樸文學所達到的高遠得多：古代人「只不過是什麼就是什麼，而我們不僅知道自己是什麼，而且看得更遠。我們

⁸⁹ 關於弗·施萊格爾和席勒的這兩篇名文，參見方維規：〈弗·施萊格爾與德國浪漫派的「文學」概念解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頁109-122；方維規：〈重溫席勒對素樸文學與感傷文學的思考——關鍵概念的誤譯造成的誤識〉，《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6期「百年校慶特刊」，頁311-319。席勒〈論素樸文學與感傷文學〉和弗·施萊格爾〈論希臘文學研究〉，標題中的「文學」之譯是筆者的建議，中文世界向來把原文中的“Dichtung”和“Poesie”譯為「詩」，例如〈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論希臘詩研究〉等，常給讀者帶來困惑，甚至只能誤解或曲解。關於筆者譯之為「文學」的理由，可參見上述兩篇概念史文章，以及方維規：〈似「詩」而非談「文學」——誤譯背後的概念史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頁141-158。

⁹⁰ Friedrich Schiller, “Ue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yhe von Briefen,” *Die Horen* 1 (1795): 1-58; 2 (1795):59-107; 6 (1795):1-41.

⁹¹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106.

經由反思而使自己成為雙重之人」。⁹²正是弗·施萊格爾和席勒重新拾起17世紀末以降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以及他們對浪漫主義現代性意識的解答所產生的影響，「古今之爭」這一思想史事件才間接地作用於社會歷史。

正是席勒和弗·施萊格爾所呈現的歷史哲學視野，才會有奧·施萊格爾（August W. Schlegel, 1767-1845）1808年回顧早期浪漫主義時的斷言：「『浪漫主義』這個名稱是為了體現現代藝術的獨特精神而發明的，與古代或古典藝術爭鋒相對。」⁹³「浪漫」一詞的歷史可追溯至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騎士小說羅曼司（romances），用「浪漫」來稱呼自己所生活的時代，表明中世紀已被看作與古代完全不同的目前基督教時代的起始和高潮（如前所述，佩羅在其世界時代與人類年紀的對比中未提中世紀），浪漫派相信自己正站在這個時代的終點。斯達爾夫人（Mme de Staël, 1766-1817）引介了來自德意志的浪漫主義新歷史觀，它在法國的接受讓人看到，隨著浪漫派告別古典主義的品位標準，形容古代藝術的「古典」一詞已經失去其規範意義。當然，還在法蘭西學院的院士們激烈爭執時，即在17、18世紀之交，法國古典主義文化已經露出衰敗的跡象。

具有重要意義的是，見之於區分藝術時代的「古典」與「浪漫」，亦被寬泛地用來區分世界歷史的不同時代。基於席勒的樸素與感傷之區分，德語大百科全書《布洛克豪斯》（*Brockhaus*）

⁹² Wilhelm von Humboldt, "Brief vom 30. April 1803," in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Schiller und Wilhelm von Humboldt*, vol. 2 (Berlin: Aufbau-Verlag, 1962), 234.

⁹³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Vorlesungen ü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eratur*, part 1, in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vol. 5, ed. Edgar Lohner (Stuttgart u.a.: Kohlhammer, 1966), 21.

1817年版中對歷史的劃分，亦分為古代與基督教現代，⁹⁴並為一些現代基本傾向辯護。幾年之後，黑格爾在其《美學》中劃分了不同歷史階段的藝術：「象徵型藝術」（前古典時代亦即古代東方藝術）、「古典型藝術」（古希臘藝術）和「浪漫型藝術」（近代藝術），並敘寫了各歷史階段占主導地位的藝術門類。所謂「浪漫型藝術」，即源於歐洲中世紀的近代基督教世界的藝術，一直延續至黑格爾生活的年代。

黑格爾的同時代人、文學家伊默曼（Karl Immermann，1796-1840）仍然以「古今之爭」中的說法論說古代和現代戲劇，⁹⁵黑格爾則堅定的從歷史哲學層面觀察問題。⁹⁶與弗·施萊格爾一樣，黑格爾輕蔑地論說了他那個時代亦即浪漫主義時代結束之後的藝術。在他眼中，與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完全「相反的是近代作品中的帶有可憐相的人物性格，例如考茨布所寫的人物看起來頂高尚、偉大、卓越，而內心卻是軟弱下賤的。後來的作家們在其他方面也不比考茨布高明，儘管他們很瞧不起考茨布。」⁹⁷從弗·施萊格爾和黑格爾對浪漫主義與他們所貶抑的「現代的」當代所作的區分，便不難理解人們對1830年之後日益頻繁的「時代運動」的積極評價。

⁹⁴ 這一界說亦見於馬克洛特1816版《百科全書》*Conversations-Lexicon oder encyclopädisches Handwörterbuch für gebildete Stände, neue vollständigere Auflage*, vol. 4 (Stuttgart: Macklot, 1816), 708, 以及1830年之後直到19、20世紀之交的《布洛克豪斯》的新版本。

⁹⁵ Karl Leberecht Immermann, "Über den rasenden Ajax des Sophokles. Eine ästhetische Abhandlung" (1825), in *Karl L. Immermann, Werke*, vol. 1, ed. Benno von Wiese (Frankfurt: Athenäum, 1971), 557.

⁹⁶ Rainer Piepmeyer, "Modern, die Moderne," in *HWPh*, vol. 6, ed.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84), 54-55.

⁹⁷ 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346。考茨布（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1761-1819），德國劇作家，創作了240多部劇作，在歐洲多國上演。

(三) 「現代」概念的歷史嬗變

19世紀以來，「現代」概念及其新的語義特徵的發展，是以「古代／現代」（antiqui/moderni）的對舉為前提的。⁹⁸庫爾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等學者在其著作中，敘寫了“antiqui/moderni”在中世紀的諸多運用狀況。⁹⁹法國特色的「古代／現代」亦即古今之爭，已成為時代變革的標記和範式。佩羅1687年在法蘭西學院對現代文化和路易十四時代的頌揚，也開啟了圍繞美學領域「現代」概念的爭辯。嗣後，在18世紀歐洲或長或短的古今之爭中，「現代」概念時常出現在美學爭辯中。¹⁰⁰當代不少學者都在其美學著述中追溯了中世紀早期以來“modern”（現代的，近代的）一詞的含義變化。¹⁰¹

在漢語表述中，西方“modern”一詞是一個很難處理的術語，本文多以「現代」述之，因為很多發展情形涉及近代人所說的他們的「現代」，基本上說的是「目前」「現實」的「新」事物，但講述「現代」並不容易。從文獻來看，5世紀晚期就有與「古代」（antiquus）相對的「現代」（modernus）之說，拉丁語形容詞“modernus”表示「目前」和「新」。一個時代或一個社會群體的自

⁹⁸ Jauß, “Schlegels und Schillers Replik,” 67-106; “Antiqui/moderni,” 410-414.

⁹⁹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ern: Francke, 1948); Walter Freund, *Modernus und andere Zeitbegriffe des Mittelalters* (Köln/Graz: Böhlau, 1957); Elisabeth Gössmann, *Antiqui und Moderni im Mittelalter: Eine geschichtliche Standortbestimmung* (München/Paderborn/Wien: Schöningh, 1974).

¹⁰⁰ Blamberger, “Moderne,” 621.

¹⁰¹ Jauß, “Literarische Tradition,” 11-66; Fritz Martini, “Modern, die Moderne,” in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ed. Werner Kohlschmidt and Wolfgang Mohr, 2nd ed., vol. 2 (Berlin: de Gruyter, 1965), 391-415; Jost Schneider, “Ein Beitrag zu dem Problem der ‘Modernität,’” *Der Deutschunterricht* 23, no. 6 (1971): 58-67.

我意識明顯區別於前代，或者努力擺脫前代狀態，人們就會談論「現代」。¹⁰²但在哲學和史學的宏觀視野中，文藝復興以降的整個近代都被視作「現代」。¹⁰³

在劃分時代時，經常出現人為的古代與現代之分。圍繞文藝復興時期的經典建築風格的爭議，關於18世紀古典主義的論爭，以及古今之爭時期文人的分裂，常會導致一種矛盾或辯證情形：著人先鞭的重要思想家、藝術家和批評家，反而用「古雅」（antico）或「古代」（anciens）來反對現代；而所謂現代，其實只是在說晚近的或時尚的現象。作為一個與時間有關的概念，「現代」似乎沒有統一的含義，除非不加批判地視之為不斷進步，這經常見於那些天真地推崇技術和自然科學文明的世界觀。¹⁰⁴若僅從最早的各種文獻來看，即不同作者如何從固有的語言慣習中推陳出新，那麼，「古今之爭」彷彿是現代性概念發展的轉折點。

在18世紀政治和政治理論中，「現代」一詞並不多見；古今之爭中獲得的新認識，彷彿尚未產生多大影響。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中世紀的封建原則被看成「現代的」；並且，在他所描繪的人類頹廢史中，當代顯然不如古代。然而，與他那個時代的古典主義藝術理論相反，盧梭並不把古代藝術看作典範。在他那裡，古代社會也是人類墮落之後才出現的，同樣建立在勞動分工和異化的基礎上。¹⁰⁵古今之爭中站在古人一邊的布瓦洛、拉辛、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¹⁰² Klaus Peter Müller, "Moderne," in *Metzler Lexikon Literatur- und Kulturtheorie: Ansätze–Personen–Grundbegriffe*, ed. Ansgar Nünning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08), 508.

¹⁰³ Blamberger, "Moderne," 620; Sabina Becker, "Moderne," in *Metzler Lexikon Literatur. Begriffe und Definition*, ed. Dieter Burdorf et al.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07), 508.

¹⁰⁴ Piepmeier, "Modern, die Moderne," 54.

¹⁰⁵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102.

Bruyère, 1645-1696) 等人，也都認為人類在不斷墮落，古人的政治哲學和文學成就是現代人無法企及的，但與盧梭不同的是，他們把古希臘、古羅馬文學當作後世的唯一楷模。

貢布萊希特 (Hans-Ulrich Gumbrecht) 認為，現代之始與彼時不同經驗相連接。他援引法國《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1765) 中的說法：現代文學始於「最後一位羅馬哲學家」波愛修斯 (Boethius, 480-524)，現代天文學始於哥白尼，現代物理學始於牛頓，儘管笛卡爾在17世紀被當作其創始人。然而，現代品位並不指向過去的某個時間點，並不絕對反對古代的東西，而是反對糟糕的品位。¹⁰⁶對古今之爭中的厚今派來說，他們實際上並不排斥古典主義美學準則，而是拒絕古典題材和古代作家的獨尊地位。在1687年後的古今之爭中，「現代」成為一個文學批評概念，被用以同古代分庭抗禮。¹⁰⁷在與「古代」捍衛者的論戰中，「現代人」成功地彰顯了近代歐洲主流文化的重要性，張揚不同時代的個性；與對古代人文的理想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現代人首先通過宣揚各種發明和發現來增強新的自我意識。然而，在18世紀初的法國文化發展中，一種新的衰落感開始蔓延，認為「古典時代」(*âge classique*) 的偉大作品無法被超越，這種感受不斷困擾著現代人及其進步理念，特別是在藝術領域。¹⁰⁸

「現代」的含義史證實了科塞雷克的一個假設，即「18世紀中期以降，典型的普通概念的含義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舊詞有了新的含義，不再需要翻譯就能走進我們當代」。¹⁰⁹18世紀晚期對於新時代的

¹⁰⁶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102.

¹⁰⁷ Jauß, "Literarische Traditio," 620.

¹⁰⁸ Piepmeier, "Modern, die Moderne," 54.

¹⁰⁹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 1, ed.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XV.

內在價值的哲學論說，是人們新用「現代」一詞並視之為時代概念的先決條件，而古代無需用這個概念來顯示其偉大之處，也不會想到這個遙不可及的目標。與啟蒙時代不同，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降，德意志哲學和美學理論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的相關討論。¹¹⁰

浪漫主義是「現代」含義史中的一個過渡時期。在18世紀末，在德意志古典主義與歐洲浪漫主義交界期的美學討論中，「現代的」當代擺脫了古代規範，成為後來幾十年中對新的當代意識進行哲學解析的起點，並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性概念。古今之爭中提出的讓現時認識擺脫古代範式，在19世紀初期幾十年的理論中得以實現。「現代」一詞原本具有與「舊」相反的「新」之含義，後來也獲得了與「永恆」相反的「短暫」、「暫時」之義。浪漫主義現代性概念的出現，則是「短暫」、「暫時」替代「新」的第一步，與之相對應的是1830年後的時代感受之根本變化。¹¹¹

在19世紀中期，人們對「現代」一詞的理解顯然直接受到全新的時代體驗的影響。「青年德意志」（Junges Deutschland）這一綱領性稱謂，¹¹²不僅蘊含「現代」之義，還有後來被頻繁使用的「青年」這個代際概念。¹¹³在「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們那裡，「現代」凝聚了所有新的追求，並被看作他們才有的追求。可是何謂「他們的現代」呢？委實難以定義，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徵。¹¹⁴「青年德

¹¹⁰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105.

¹¹¹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96, 109, 130.

¹¹² 「青年德意志」是指德國的一些年輕的自由派作家受到法國七月革命的影響，於1830年發起的文學運動，1835年遭查禁。「青年德意志」之名是勞貝（Heinrich Laube, 1806-1884）最先提出的，因維因巴爾克（Ludolf Wienbarg, 1802-1872）而流行起來，他在1834年出版的演講集《美學的出征》（*Ästhetische Feldzüge*）中開場便說：「我把這些演講獻給你，青年德意志，而不是舊德國。」

¹¹³ 這種「青年」概念一直延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先鋒派運動，往往是為了凸顯自己是對抗既有團體的新團體。

¹¹⁴ Piepmeier, "Modern, die Moderne," 55.

意志」之名的發明者勞貝（Heinrich Laube, 1806-1884），很喜歡用「現代」一詞；他說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是「現代派典型」，¹¹⁵並說你可以「用政治的、歷史的、地理的、統計的、詩意的、田園詩般的、諷刺的、幽默的方式寫作，用任何你想用的語言寫作，但一定要用現代的方式」。¹¹⁶在德意志「後觀念論」時代，「現代」一詞失去了席勒那種未來主義傾向，而是要干預現實。「青年德意志」反對古典主義者和浪漫派，反對先前的文學傳統，但那些年少氣盛者並無明確而具體的設想，只是一味強調「現代」、「進步」之於「傳統」的優先地位。¹¹⁷

如前所述，「現代」是指某種新近的東西，但很多人的感覺是今不如昔，而早先的時代已經過去，其準則要麼不再可能實現，要麼不再適用。因此，19世紀以降，現代性意識可以將最發達的藝術或技術手段與道德或社會的失落感或危機感放在一起，「現代」之說在這些方面比在政治或哲學中出現得更頻繁。如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生活中，「現代」一詞沒起什麼作用；在哲學中，這個詞語也常與哲學概念相衝突。因此，與不同時代或情境相關的理論，便在美學領域構建了「現代性」概念。¹¹⁸

19世紀的不少詩學理論頗為極端地改變了「美」的經典範疇，例如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崇尚的不是「美」，而是「人為」和「新」，還有醜和痛苦。全新的「現代」

¹¹⁵ Martini, "Modern, die Moderne," 403.

¹¹⁶ Heinrich Laube (Brief 6. 2. 1833), quoted in Martini, "Modern, die Moderne," 403.

¹¹⁷ Blamberger, "Moderne," 621.

¹¹⁸ Piepmeier, "Modern, die Moderne," 54-55. 在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現代」之說可以指（1）克服各種規範詩學、尤其是1795年前後的早期浪漫派所開創的時代；也可以指（2）波德萊爾在1850年前後始創的象徵主義所帶來的審美變革和題材創新時代；在德國還可以指（3）1885年之後隨著自然主義和對法國象徵主義的接受所開啟的藝術發展時代。

（“la modernité”）一詞，¹¹⁹被波德萊爾提升為新美學的綱領性詞彙，不再與以時代劃分的、權威的過去作對比。¹²⁰文學現代性體現於不斷增長的自我意識，其明顯特徵是現代常見的自相矛盾的情形。波德萊爾在〈現代生活的畫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1863）一文中，將新的時代感轉化為現代性之美學理論；他的深刻且頗有預見性的理論，亦可運用於後來的藝術先鋒派的自我形象，成為現代藝術理論的奠基石。從概念史視角來看，波德萊爾的現代性理論不僅標誌著藝術之自我認識的轉折點，它還充分體現出「時間的歷史化」（“Historisierung der Zeit”），¹²¹即前文所述「現代」被用作「永恆」的反義詞，表示「短暫」和「暫時」。¹²²

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關於西方文化衰落的理論中，「現代」之義與許多同時代人的觀點完全不同。那些人的準則不是希臘，而是緊鄰本時代的前代德意志古典主義；不是通過新人來克服令人鄙夷的現代性，而是賡續前人所宣揚的所謂德意志民族理想。這些當然都是尼采嚴厲批評的對象。在尼采看來，民族主義是「本世紀的疾病」。¹²³他的「現代性批判」涉及科學、

¹¹⁹ “la modernité”首次出現於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的《墓畔回憶錄》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Paris: Eugène et Victor Penaud, 1849), 183.

¹²⁰ Jauß, “Antiqui/moderni,” 414.

¹²¹ Gumbrecht,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111.

¹²² 1972年出版的法國《通用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第四版中的長篇文章“Modernité”確認，「短暫」、「暫時」之義也融入了「現代」的語言規範。現代性被定義為運動範疇，一種變革的道德規範。變革的必要性緣於一種意識，即現在是通向未來的暫時通道，而未來與傳統的導向截然相反，那是一種與傳統相對立的文明模式。

¹²³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vol. 1, ed. Karl Schlechta (München: Hanser, 1960), 916.

藝術和政治，¹²⁴依託於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批判，但對之做了全面、深刻的闡釋。在尼采眼裡，現代性是一種不良發展的後果，這一發展始於蘇格拉底（Socrates，470-399BC）的教義，經基督教、新教、啟蒙運動和19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而達到頂峰。「現代意識形態」所理解的進步，導致「奴隸道德」之蔓延。¹²⁵現代性運動的基礎及其形成是一種歷史認識，教導人們依附於外來事物，而不是成為活生生的自我。¹²⁶「食品、文學、報紙、形式、趣味乃至風景的世界主義」，¹²⁷都被他解釋為令人生疑的現代性之標誌。由於自我的缺失，現代人「受制於各種道德」，¹²⁸因而苦於「人格的弱化」。¹²⁹這一切都是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強烈對立造成的，而「這種對立是古人不會看到的」。¹³⁰

¹²⁴ Nietzsche, *Werke*, 2: 1141.

¹²⁵ Nietzsche, *Werke*, 2: 730.

¹²⁶ Nietzsche, *Werke*, 1: 213.

¹²⁷ Nietzsche, *Werke*, 3: 627-628.

¹²⁸ Nietzsche, *Werke*, 2: 682.

¹²⁹ Nietzsche, *Werke*, 1: 237.

¹³⁰ Nietzsche, *Werke*, 1: 232.

結語

歷史學家都會有一種學術感受：增進和提高認識的單項專門研究而外，只有少數見解是以前尚未發現或闡述的。歷史學在不同時代都有一個不斷受到質疑和不斷重新思考的共享知識空間。但比在其他學科中更常見的情形是，歷史的所有進步總會帶來一些只需重新表述而不一定是新的見解。¹³¹或許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這篇文章，但它還是力求在史料的基礎上提出我的看法，或曰對於史料的新的整合和「重新表述」。

本文起首便提出歷史分期之難題，繼而提出「近代」起始於何時的問題。因為歷史分期均可被看作「理想型」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多種分期方案。雖然不宜對歷史時期做籠統劃分，但一般說來，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可被視為近代之始，法國大革命或舊制度的終結則是近代的終了。以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概念為例，即在很大程度上緣於19世紀、至今依然有效的文藝復興形象：「發現世界和人」，很能呈現新時代之主體性強勢崛起的新的人類形象，以及一種不再完全受教會影響的文化中的「生活氛圍」。¹³²近代亦即新時代是一個劃時代發明和發現的時代。人們最終有了中世紀人沒有的時代意識和生活在新時代的感受，新的時代、新的歷史概念得以確立。

不過，近代人有一種幻想：別指望他們認可一切現實，他們以為自己可以支配自然，為自己制定法律並創造自己的歷史。「尤其是新的、以數學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的興起，從理論上解釋自然，愈加教導人們如何在實踐中控制自然。」¹³³在這種信念盛行的地方，

¹³¹ Koselleck, "Wie neu ist die Neuzeit?," 539.

¹³² Huizinga, *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162.

¹³³ Koselleck, "Wie neu ist die Neuzeit?," 540.

生活不再有任何舒緩，只能不停地勞作。¹³⁴啟蒙運動也將世事變遷視為人之努力所致。（19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基本上也都秉持這種觀點。）

歷時長久的古今之爭，雖然無所謂勝負，但是激發了人們的批判精神和挑戰古代經典的膽量，這又充分體現於後來啟蒙時代的新的歷史觀。諸多德意志哲人對現代與古代、中世紀之間關係之全面的重新定義與歷史哲學思考，真正轉化了古今之爭的成果。尤其是浪漫主義的「現代」定義所體現的歷史哲學反思，展示出對抗古代或古典藝術的鋒芒，從而也使古代經典失去了規範意義。當然，只有在專門的理論框架內，才能對概念的含義劇變做出明確的歷史定位。概念的變遷牽涉諸多複雜問題，概念史方法會注重語言規範的變化，這種變化在「現代」概念的歷史嬗變中顯而易見。

世界近代史常被描述為權力猛增的歷史，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進步讓人的權力大增，但這只是近代發展的一個方面。主體性的力量日益增強，與之相隨的卻是一種新的無力感，這種狀況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已出現；當時，人們對自己的創造力信心百倍，同時又認識到自己是命運的玩物。這在近代發展進程中有增無減，導致啟蒙的正負兩面（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辯證看啟蒙》，1947），¹³⁵目的理性的主導地位（馬克斯·韋伯），支配論之形而上學的凱旋（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人之活力的喪失（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¹³⁶

¹³⁴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3.1: 2-3.

¹³⁵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Querido, 1947)

¹³⁶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3.1: 2.

從單一維度來敘寫近代是不可能的。任何宣稱近代只是進步或倒退的人，都會忽視近代的內在矛盾。只想講述進步史的人，必然要淡化極權主義和這個時代的挫折。只想講述衰落史的人，則會否認近代的成就：近代之前沒有的人權之進步、某種程度的自由、生活方式的多樣性等。若只關注近代的新事物，認識會很片面；而擁抱新事物的激情卻是近代的標誌，但這種激情也帶著道德或社會的失落感和危機感。

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對於新事物給人的承諾就有不少閒話。在盧梭那裡，已能見出現代性的第一次危機，即對時代承諾的第一次重大懷疑。保守主義對進步主義的回應，呈現出第二次危機。尼采對顯而易見的虛無主義的反思，可被看作這些危機中的最後一個；這位相信「相同者之永恆輪回」的哲學家，不再相信任何進步或任何新事物的許諾。¹³⁷從尼采到阿多諾，豐富多彩的審美現代性話語都會大書特書現代危機，同時解構和調侃舊事物，為了給新的、尚未出現的事物騰出空間。¹³⁸

¹³⁷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3.1: 2.

¹³⁸ Blamberger, "Moderne," 621.

徵引書目

- 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
《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85-116。
- 方維規：〈似「詩」而非談「文學」——誤譯背後的概念史問題〉，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頁141-158。
- 方維規：〈弗·施萊格爾與德國浪漫派的「文學」概念解證〉，《北
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頁109-122。
- 方維規：〈重溫席勒對素樸文學與感傷文學的思考——關鍵概念的
誤譯造成的誤識〉，《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
第6期「百年校慶特刊」，頁311-319。
- 伏爾泰著，王燕生譯：《哲學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
- 馬克斯·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培根著，許寶騷譯：《新工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Achilles, Walter. *Landwirtschaf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nzyklopädie
deutscher Geschichte*, vol. 10. München: Oldenbourg, 1991.
- Baron, Hans. "The Querelle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as a Problem
for Renaissance Scholarship."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
(1959): 3-22.
- Becker, Sabina. "Moderne." In *Metzler Lexikon Literatur. Begriffe und
Definition*, edited by Dieter Burdorf et al., 508-509.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07.
- Below, Georg von. *Über historische Periodisierungen 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enze zwische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1925.

- Blamberger, Günter. "Moderne." In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vol. 2, edited by George Braungart et al, 620-624. Berlin: de Gruyter, 2007.
- Braun, Hermann. "Wel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 7, edited by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433-509.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2.
- Buck, August. *Die italienische Renaissance aus der Sicht des 20. Jahrhunderts*. Stuttgart: Steiner, 1988.
- . "Burckhardt und die italienische Renaissance." In *Renaissance und Renaissancismus von Jacob Burckhardt bis Thomas Mann*, edited by August Buck, 5-12. Tübingen: Niemeyer, 1990.
- Burckhardt, Jacob. *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Basel: Schweighauser, 1860.
- . *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Stuttgart: Kröner, 1958.
- Burke, Peter. *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420-1540*. London: Batsford, 1972.
- . *The Renaiss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 .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8.
- Cassirer, Ernst. *Individuum und Kosmos in der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 1927. Reprin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7.
-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de. *Mémoires d'Outre-tombe*. Paris: Eugène et Victor Penaud, 1849.
- Curtius, Ernst Robert.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ern: Francke, 1948.

- Ficion, Marsilio. *Opera*. Firenze: Antonio Miscomini, 1491; Venezia: Aldo Manuzio, 1516; Basel: Henricus Petrus, 1561.
- Freund, Walter. *Modernus und andere Zeitbegriffe des Mittelalters*. Köln/Graz: Böhlau, 1957.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Querido, 1947.
- Gerhard, Dietrich. "Periodization in History." In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 edited by Philip P. Wiener, 476-481. New York: C. Scribner Sons, 1973.
- Gössmann, Elisabeth. *Antiqui und Moderni im Mittelalter: Eine geschichtliche Standortbestimmung*. München/Paderborn/Wien: Schöningh, 1974.
- Gumbrecht, Hans-Ulrich. "Modern, Modernität, Modern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 4, edited by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93-131.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 Günther, Horst. *Freiheit, Herrschaft und Geschichte: Semantik der historisch-politischen Welt*.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 . "Neuzeit, Mittelalter, Altertum."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HWPh)*, vol. 6,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 782-798.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84.
- . "Renaissance."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vol. 8,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 783-790.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92.
- Hardtwig, Wolfgang. "Jacob Burckhardts *Kultur der Renaissance* und Max Webers *Protestantische Ethik*. Ein Vergleich." In *Renaissance und Renaissancismus von Jacob Burckhardt bis Thomas Mann*, edited by August Buck, 13-23. Tübingen: Niemeyer, 1990.

- Heeren, Arnold Hermann Ludwig.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und seiner Colonien*, vol. 1. Göttingen: Röwer, 1809.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Ue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teratur” (1767). In *Sämmtliche Werke*, vol. 1, edited by Bernhard Suphan, 383-400. Berlin: Weidmann, 1877.
-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2.
- Huizinga, Johan. *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und Realismu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4.
- Humboldt, Wilhelm von. “Brief vom 30. April 1803.” In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Schiller und Wilhelm von Humboldt*, vol. 2. Berlin: Aufbau, 1962.
- Immermann, Karl Leberecht. “Über den rasenden Ajax des Sophokles. Eine ästhetische Abhandlung” (1825). In *Karl. L. Immermann, Werke*, vol. 1, edited by Benno von Wiese, 554-603. Frankfurt: Athenäum, 1971.
- Janssen, Evert Maarten. *Jacob Burckhardt und die Renaissance*. Assen: Van Gorcum, 1970.
- Jauß, Hans Robert. “Ästhetische Normen und geschichtliche Reflexion in der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In *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en ce qui regarde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 by Charles Perrault, edited by Hans. R. Jauß, 8-64. München: Eidos, 1964.
- . “Literarische Tradition und gegenwärtiges Bewußtsein der Modernität” (1965). In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11-66.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 . “Schlegels und Schillers Replik auf die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1967). In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67-106. Frankfurt: Suhrkamp, 1970.

- . “Antiqui/moderni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vol. 1,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 410-414.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71.
- Klose, Dagmar and Marco Ladewig, eds. *Die Herausbildung moderner Strukturen i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der Frühen Neuzeit*. Potsdam: Universitätsverlag Potsdam, 2010.
- Koselleck, Reinhart.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vol. 1, edited by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Reinhart Koselleck, XIII-XXVII.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 .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 . “Wie neu ist die Neuzeit?”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1 (1990): 539-553.
- Köster, Heinrich. “Historie.” In *Deutsche Encyklopädie, oder Allgemeines Real-Wörterbuch aller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 vol. 12. Frankfurt: Varrentrapp (Sohn) und Wenner, 1778-1804.
- Leyden, William von. “Antiquity and Authority: A Paradox in Renaissance Theory of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 (1958): 473-492.
- Martini, Fritz. “Modern, die Moderne.” In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2nd edition, vol. 2, edited by Werner Kohlschmidt and Wolfgang Mohr, 391-415. Berlin: de Gruyter, 1965.
- Max, Horkheimer, and Adorno Theodor W.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Querido, 1947.
- Meuer, Marlene. *Polarisierungen der Antike: Antike und Abendland im Widerstreit-Modellierungen eines Kulturkonflikts im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 Heidelberg: Winter, 2017.

- Meuthen, Erich. *Das 15. Jahrhundert*. München: Oldenbourg, 1984.
- Michelet, Jules. *Histoire de France 7: Renaissance*. Paris: Chamerot, 1855.
- Mirandola, Giovanni Pico della. *Über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1496)*. Translated by Herbert W. Rüssel. Zürich: Manesse, 1988.
- Müller, Klaus Peter. "Moderne." In *Metzler Lexikon Literatur- und Kulturtheorie: Ansätze–Personen–Grundbegriffe*, edited by Ansgar Nünning, 508-511.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08.
- Nietzsche, Friedrich. *Werke*. Edited by von Karl Schlechta, 3 vols. München: Hanser, 1960.
- Popelinière, Lancelot Voisin de la. *L'Histoire des histoires*. Paris: Marc Orry, 1599.
- Ottmann, Henning.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vol. 3.1, *Die Neuzeit. Von Machiavelli bis zu den großen Revolutionen: Einleitung*. Stuttgart: Metzler, 2006.
- Perrault, Charles. *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en ce qui regarde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 Edited by Hans Robert Jauß. München: Eidos, 1964.
- Piepmeier, Rainer. "Modern, die Moderne."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vol. 6,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and Gottfried Gabriel, 54-62. Basel/Stuttgart: Schwabe, 1984.
- Rudolph, Enno. "Wußte die Renaissance, daß es sie gab? Elemente einer vormodern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in der Renaissance." In *Die Renaissance und ihr Bild in der Geschichte*, edited by Enno Rudolph, 1-1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8.

- Schiller, Friedrich. "Ue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yhe von Briefen." *Die Horen* 1 (1795): 1-58; 2 (1795): 59-107; 6 (1795): 1-41.
- Schlegel, August Wilhelm. *Vorlesungen ü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eratur*, part 1. In *Kritis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edited by Edgar Lohner, vol. 5. Stuttgart u.a.: Kohlhammer, 1966.
- Schneider, Jost. "Ein Beitrag zu dem Problem der 'Modernität.'" *Der Deutschunterricht* 23, no. 6 (1971): 58-67.
- Schulze, Winfried. "'Von den großen Anfängen des neuen Welttheaters': Entwicklung, neuere Ansätze und Aufgaben der Frühneuzeitforschung."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4 (1993): 3-18.
- Spangenberg, Hans. "Die Perioden der Weltgeschicht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27 (1923): 1-49.
- Troeltsch, Ernst.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Tübingen: Mohr, 1922.
-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Gedanc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cke in der Mahlerey und Bildhauer-Kunst*. Friedrichstadt: Hagenmüller, 1755.
- . *Kunsttheoretische Schriften*, vol. 1. Baden-Baden/Strasbourg: Heitz, 1962.
- Wikipédi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Accessed September 2, 2024. https://fr.wikipedia.org/wiki/Querelle_des_Anciens_et_des_Modernes.

